

收入不确定性 对我国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

——基于缓冲储备模型的实证研究

□ 郭英彤

(吉林大学 商学院, 长春 130012)

摘要: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我国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特点, 从而找出影响城市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本文将缓冲储备模型进行适当改进, 使其更适合消费行为研究, 并应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 实证检验居民在收入不确定性下的消费行为模式。结果表明缓冲储备模型能够解释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 而且以目标比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更适合作为未来研究的基础框架。

关键词: 缓冲储备; 收入不确定性; 消费行为

中图分类号: F1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682(2011)06-0052-05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 内需不足一直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概括为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同类数据相比严重偏低; 同时, 居民消费对 GDP 增长率的贡献率远低于投资。党中央实际上自 1998 年就制定了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 此后每年中央也都将这项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先后出台了很多刺激内需的政策。我国学术界也投入大量精力研究如何解决扩大内需问题, 这期间涌现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是, 截至目前内需不足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定量分析中使用的数据多数为统计年鉴上的宏观数据(基于入户调查的全国或者各个省份汇总的数据), 使用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比较少, 而能再进一步进行分类研究的则更少。

本文使用来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微观入户调查数据, 应用缓冲储备模型实证检验预防性储蓄动机对我国哪类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影响最显著。

一、文献回顾

国内外针对收入不确定性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往往采用经典的消费理论模型, 即标准的生命周期假说(LC)和持久收入假说(PIH)。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极受关注的一些理论流派也颇为流行, 如 Hall 的随机游走假说^[1], Leland^[2] 提出并由 Hubbard、Skinner 和 Zeldes^[3] 进一步丰富的预防性储蓄假说, Zeldes 提出^[4]、Jappelli 和 Pagano^[5] 加以检验的流动性约束假说。我国学术界在研究预防性动机影响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程度与机制方面也论著颇丰, 如万广华等^[6]、樊潇彦等^[7]、杭斌^[8]、姜峰和李雪松^[9] 对西方消费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根据中国消费情境证实了持久收入、预防性储蓄倾向、流动性约束、消费生命周期、收入分配差距等是制约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他们所提出的对策也主要集中在提高实际收入,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以及健全资本市场等方面。

针对产生预防性动机的成因, 国外学者基本上选择将收入上的不确定性作为唯一重要因素, 而我

收稿日期: 2011-09-07

基金项目: 吉林大学“科学前沿与交叉学科创新项目”及“社会科学研究种子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郭英彤(1972 -), 男, 吉林长春市人, 博士, 吉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国的研究成果中虽然多数学者也以收入上的不确定性为唯一指标,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医疗支出、教育支出、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纳入经济计量模型,如罗楚亮^[10]以及郭英彤^[11]的研究都表明这些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可能是导致我国居民预防性动机的主要因素,其中医疗支出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最为显著。

Carroll 在 1997 年^[12]发表的论文、Carroll 与 Samwick^[13]的研究,以及 Gourinchas 与 Parker^[14]的文章都指出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以及使用对数线性欧拉方程分析消费行为的研究方法应该被新的理论框架,即缓冲储备理论所取代。在对缓冲储备理论进行验证的过程中,这些作者以及 Cagetti^[15]的研究较著名。我国的学者也越来越重视对该理论的研究,郭英彤和李伟^[16]的研究应用缓冲储备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居民的储蓄行为,结果表明该理论框架在解释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时具有一定的优势。

最早使用缓冲储备这个概念解释预防性储蓄动机的是 Deaton^[17]。在此基础上,Carroll^[18]又提出了一个改进的缓冲储备模型,并且对缓冲储备的概念给予了更细致的刻画。缓冲储备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如果消费者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并且如果预期未来有更高收入,同时又是不耐心的,他们倾向于选择大于当前收入的消费;储蓄相当于一种缓冲储备,以便在境况艰难时维持消费水平,而在境况如意时增加消费。遵循缓冲储备原则的消费者会在心目中设定一个财富对持久收入的目标比率,如果低于该目标,预防性储蓄动机将战胜不耐心从而加大储蓄,反之,不耐心就会占上风从而使消费者选择降低储蓄。缓冲储备模型中的关键假设和约束条件主要包括:(1)存在收入为零的可能性。这一条件与具有常数相对风险厌恶型效用函数(CRRA)相结合就将流动性约束内生化了。(2)消费者具备“缺乏耐心”的特征。这一条件意味着,消费者更看重的是当期消费,不仅如此,一旦感到储备充分,消费者宁愿增加当期的消费。该条件是保证边际消费倾向为正的必要条件。

虽然缓冲储备模型不具有解析解,但是它能够证明财富对持久收入的目标比率与收入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或者说不确定性对目标比率具有理论上的显著影响。这为构造经验研究中的计量模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针对不确定性的测度问题,Kimball^[19]基于预防性储蓄提出了一种理论方法,即“等价预防性溢价(EPP)”。为了能够比较合理地衡量不确定性,Car-

roll 与 Samwick 在 1998 年的研究中用了一个相对简化的指标,“相对等价预防性溢价(REPP)”。

二、数据和模型

1. 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该数据库是美国北卡罗那大学及中国预防科学医学院联合调查创建的,它包括了辽宁、黑龙江、山东、江苏、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和广西 9 个省份的数据。调查的年份有 1989、1991、1993、1997、2000、2004、2006 年和 2009 年,共 8 次调查数据。每次调查都访问大约 200 个城乡社区,每个社区访问 20 个左右的住户,涉及的人口数达到 13000 - 15000 人,城乡比例大致为 1:2。该数据库的调查项目包括家庭调查、健康与营养调查、体育活动、老人调查、身体状况及大众媒体行为和实、已婚妇女调查等。该数据库的特点是数据样本量大,数据截面比较多。并且,该数据库是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统计数据相比更适合于进行个体家庭消费与储蓄行为的研究,在解释家庭消费与储蓄行为方面具有更强的说服力。由于该数据库是由专门人员实地调查而来,因此具有很强的数据可靠性,基于该数据库的研究结论也相应地更具说服力。

本文所用到的调查数据主要来自于城市居民的“家庭调查”数据库,包括家庭收入、家庭财产、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年龄等指标。该数据库包括的 8 次调查数据中每次接受调查的家庭数目都不相同,其中 2009 年最多,共有 4517 个家庭,其次是 2006 年,共有 4466 个家庭,而 1993 年数量最少,只有 3456 个家庭。由于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上世纪末期至当前的城市居民消费行为,因此,本文选择 1997 - 2009 年的数据。经过筛选,共有 525 个家庭连续接受了这一期间的五次入户调查,并且在本文关注的指标中没有遗漏。由于辽宁省缺少 1997 年的数据,因此,最终的样本中没有该省数据。

2. 模型

缓冲储备理论在经验研究中建立的计量模型的基本结构应该是:

$$\ln\left(\frac{W}{P}\right) = \alpha_0 + \alpha_1 \omega + \varepsilon \quad (1)$$

其中, W 和 P 分别代表家庭的财富和家庭的持久收入,代表不确定性。由于等式左边是对数形式,实际应用中学者们习惯使用该模型变形后的扩展形式,即:

$$\ln(W) = \alpha_0 + \alpha_1 \ln(P) + \alpha_2 \omega + \varepsilon \quad (2)$$

本文也将(2)式作为主要的模型进行经济计量

分析,下面将对模型中的各个变量进行说明。

首先,家庭财富。理论上,家庭财富应该是去掉不动产和自有企业后的家庭净资产期末余额。一般学者会使用流动性比较强的资产,比如我国学者常用的银行存款。遗憾的是,中国健康营养调查数据中没有银行存款的数据,该数据库中很多通常被当作反映消费水平的指标作为城市家庭资产的替代指标,主要涉及到:房产重购价值、购买汽车与摩托车所支付的费用、购买耐用消费品(具体包括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自行车、音响、电扇、照相机、摄像机、电脑、微波炉、手机、电子厨具、卧室家具)所支付的费用。这样做的苦衷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中国人不喜欢将自己的财产状况告诉家庭以外的人,哪怕是好朋友,更不要说象调查员这样的陌生人。因此,通过记录家庭购买上述商品的活动不仅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家庭净资产的变化,而且要比直接询问受访家庭的“家庭资产总额”要准确得多。

更重要的一点是,缓冲储备模型本来应该研究的是财富对持久收入的目标比率,但是在实际研究中这个目标比率是无法直接获得的数据,少数学者采用了模拟技术推算或拟合出该数据,但多数情况下学者们直接对(2)式进行估计。这样处理虽然舍本逐末,但是比较实用、可行。本文认为,使用家庭净资产的变化要比使用净资产期末余额更能接近目标比率的实际值,因为资产的变化能够更好地反映出在目标比率作用下的缓冲储备行为。此外,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要检验预防性动机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缓冲储备模型原结构并不能直接用来解释消费行为,当我们使用家庭净资产十二年里的变化幅度去替代期末余额时,就可以将一个局限于解释储蓄行为的模型转化为一个解释消费行为的模型。

其次,家庭永久收入。学者们度量永久收入的方法多种多样。有的用相对稳定的经济地位来推算家庭永久收入;有的重新构造一个指标,比如樊潇彦等的方法,他们首先计算每次调查中每个家庭年收入与当年所有家庭年收入均值的比值,然后取几个比值的加权平均数,最后用该平均数乘以每年家庭收入均值;还有的直接采用工资性收入作为持久收入的替代指标。本文计量分析时使用的家庭永久收入是通过计算1997-2009年间五次调查中家庭各年总收入的平均值得到的。这样做的原因是:第一,缺乏有关工资性收入的数据;第二,调查数据中的城市家庭总收入包括个体经营收入、工资收入、退休金、各种补贴以及其它收入,除“其它收入”外的各项都接

近于稳定的工资收入,因此可以看作持久收入的替代值。“其它收入”具有临时性收入的可能性,由于没有详细的说明,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因此通过取平均值的方法尽可能消除其“临时性收入”的影响;第三,虽然只有五次调查,但是其时间跨度为十二年,本文计算的平均值应该能够反映出样本期间的平均收入水平。

第三,家庭收入不确定性。针对收入不确定性的度量问题,学者们采用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有的按照REPP计算,有的通过问卷得到,有的先计算失业的概率然后合成不确定性,多数研究都是从序列的方差入手构造替代指标。从研究的结果看,多数替代指标的效果都令研究者满意。比如Carroll与Samwick使用两种方法衡量家庭收入不确定性,即REPP和对数收入的方差,通过比较,这两者的表现很接近。本文在构造不确定性指标时按照地区将样本分为8组,首先取每次调查中每组“家庭总收入”的平均值,然后将五次调查的平均值形成序列,再通过核密度估计得到该序列的平均值并作为每组中各个家庭在1997-2009年间的预期家庭总收入;最后,计算每个家庭收入方差,并将该方差作为名义收入不确定性的衡量指标。

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都很大,因此,每个家庭对不确定性的感知往往与其所在地域有很大关系。本文的这种构造方法就是要将这种特点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来。此外,为了更准确地反映收入不确定性,本文还计算了由实际家庭总收入序列得到的实际收入不确定性,计算方法同上。

第四,人口特征。本文选择了年龄和教育程度。首先,“年龄”指标的定义。从CHNS的数据来看,很多家庭因为所有成员都填写了问卷,所以必须进行合成才能够得到该家庭唯一的一组数据。在下面的计量分析模型里,年龄不是一个人的年龄,而是家庭平均年龄。具体计算步骤是:第一步,如果家庭人口数超过1,则剔除1997年未满18周岁和超过68周岁的家庭成员的相关数据。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在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一旦样本家庭属于大家庭性质,在家庭经济活动中决策过程会涉及到年龄在18-68周岁的所有成员,最后的决定也将突出反映这个年龄区间的家庭成员的偏好。如果家庭所有人口都在1997年超过68周岁,则不进行剔除。第二步,按照人数进行算术平均。其次,“受教育程度”指标的定义。在原始数据中,受教育程度的

描述方法是:未上过学的取值为0、小学毕业的取1、初中毕业的取2、高中毕业的取3、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取4、大专和大学毕业的取5、硕士以上的取6。在根据“家庭平均年龄”修正后的数据基础上,受教育程度也是按照家庭人口进行平均得到的。对受教育程度进行平均的理由也与对年龄进行平均的理由相似,家庭经济决策的模式会随着人口增加而变得复杂,更难做出判断的是单个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在这个复杂条件下会有什么样的作用,但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是,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应该对行为模式和决策模式产生影响。本文认为做出上述修正后,无论是家庭平均年龄还是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都已经考虑到性别和家庭人口数的影响,因此性别和家庭人口数这两项常被列入统计模型的人口变量没有放进最终的经济计量模型中。

本文最终的经济计量方程是:

$$\ln(W) = \alpha_0 + \alpha_1 \ln(P) + \alpha_2 \omega + \alpha_3 \text{age} + \alpha_4 \text{edu} + \varepsilon \quad (3)$$

其中,age代表年龄;edu代表受教育程度。

三、计量检验结果与分析

储蓄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奢侈品,收入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家庭很难进行储蓄。从缓冲储备模型的理论经验研究看,具备这种行为特点的消费者必须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且收入水平不能过低。在我国,地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都很大,社会各界对高、中、低各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没有达成共识。而且,经过整理后的样本数量已经由几千个下降到525个,为了能够充分利用所有观测数据,我们对整个样本做了计量检验,寄希望于无论高收入还是低收入家庭都体现出缓冲储备行为。但是遗憾的是,即便在修正了异方差问题后,自相关问题依然严重(为节省篇幅估计结果略),因而,对本文的计量检验而言,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难题就是如何选择恰当的收入群体作为样本。

本文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以汽车消费作为参考指标划分收入群体,进而筛选样本的方法。在1997-2009年间我国处于富裕阶层的家庭都购买了家庭用汽车,很多具有比较高的稳定收入的家庭也购买了汽车。因而,是否购买汽车或是否具有购买汽车的实力则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划分标准。具体而言,一般认为这个时期中档汽车的价格应在10万-12万元左右,再加上购置税、牌照和保险等费用,购买该类汽车的费用应该在13万-15万元。我们选择中档汽车的价格作为标准而没有使

用是否购买中档汽车作为标准,主要是因为各个家庭的偏好会有比较大的差别,有的家庭可能会买更便宜的车,有的家庭可能会买更贵的车,也有的家庭会推迟买车的日期。作为参照指标,购买中档汽车的费用应该能够比较好地反映出家庭的经济实力。因此,本文将525个样本中1997-2009年五次调查的总消费额低于15万元的家庭去掉。最终的样本量为312个。

使用EViews6.0对公式(3)进行回归。初步回归结果中的“受教育程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通过观察和查阅文献发现,永久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共线性,因为有关收入决定的理论模型中受教育程度往往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因而,在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中本文去掉了“受教育程度”。估计结果如表1:

表1 不确定性对资产净增量的影响

	模型一(名义收入)	模型二(实际收入)
不确定性	0.03***	0.08***
永久收入	0.499***	0.35***
年龄	-0.006*	-0.006*
常数项	6.23***	7.8***
Adjusted R ²	0.18	0.11

注:***代表在1%水平下显著; **代表在5%水平下显著; *代表在10%水平下显著。

由表1可以看出:不论是使用名义收入产生的不确定性(模型一)还是实际收入产生的不确定性(模型二),模型总体解释力都比较好,而且不确定性和永久收入的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这两组系数的估计结果看,不确定性对家庭财产净增量的影响小于永久收入的影响。年龄则对家庭财产净增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家庭资产净增量随着家庭平均年龄的增加而减少,但是这种影响比较小,而且只在10%水平下显著。

为了进一步说明缓冲储备行为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我们有使用平均资产增加额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但是只针对模型一进行了检验,原因是根据表一的结果,模型一与模型二的效果非常接近。检验结果表明,将因变量改为资产平均增量并没有改变模型的整体效果。

前面的检验实际上使用的都是(1)式的扩展形式,虽然这是普遍采用的方法,但是,由于缓冲储备模型的核心是检验不确定性对目标比率的影响,本文使用目标比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构造了下面的模型:

$$\ln(\text{ratio}) = \alpha_0 + \alpha_1 \omega + \alpha_2 \text{age} + \alpha_3 \text{edu} + \varepsilon$$

需要指出的是,前面的回归分析中由于永久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共线性,所以受教育程度没有放入最终的回归方程;表二的回归分析中因为被解释变量是目标比率,永久收入不再作为解释变量出现,所以加入“受教育程度”也不会出现共线性问题。

检验结果如表 2:

表 2 不确定性对目标比率的影响

	模型一(名义收入)
不确定性	0.054***
年龄	-0.006*
受教育程度	-0.044
常数项	1.25***
Adjusted R ²	0.27

注:***代表在 1% 水平下显著; **代表在 5% 水平下显著; *代表在 10% 水平下显著。

表 2 的结果有些出乎意料:模型的整体解释能力显著上升;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对消费水平的变化没有显著影响,这个结果与我们一般的认识存在差距。

为了比较收入高低对研究的影响,本文对 525 个样本中剩余的 213 个低收入群体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存在显著的自相关性,也就意味着缓冲储备模型不适合解释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大致勾勒出我国城市家庭的消费行为特点:

(1)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显示收入不确定性的系数显著非零而且为正,这表明我国收入比较高的城市家庭具有明显的预防性动机。同时,还可以看出,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促使这些家庭购买更多的耐用消费品。本文认为,产生这种行为的原因可能是耐用消费品提供的满足程度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而且在通货膨胀比较明显且与储蓄利率相比处于比较高的水平时,购买耐用消费品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保值的意义。

(2) 从计量模型检验结果来看,受教育程度对我国城市家庭的消费行为具有比较复杂的影响机制。一般认为受教育程度高的消费者应该更知道如何合理消费,而不是拘泥于传统的节俭型的消费观,也就意味着受教育程度高的消费者应该具有缓冲储备行为特点,但是,本文的检验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没有对消费目标比率产生显著影响。这其中的原因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3) 从计量模型检验结果来看,年龄对我国城市

家庭的消费行为有显著的影响。由于我们使用的是家庭平均年龄,这个结果意味着当家庭对重要购买活动进行决策时,年龄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家庭人口的年龄结构对决策影响显著。这一点符合我国的社会文化特征,特别是尊老爱幼的行为标准。

四、结论

上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内需严重不足一直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我国学术界也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如何解决扩大内需问题,但是,截至目前内需不足问题依然突出,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定量分析中使用的数据多数为统计年鉴上的宏观数据,使用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比较少,而能再进一步进行分类研究的则更少。本文使用来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微观入户调查数据,研究的目的是探讨我国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特点,从而找出影响城市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本文对缓冲储备模型进行适当改进,使其更适合消费行为研究,并实证检验中国城市居民在收入不确定性下的消费行为模式。

从计量分析的结果看,缓冲储备模型在解释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同时,通过对检验结果比较看,在今后使用缓冲储备模型的研究中,选择目标比率(无论是目标消费比率还是目标储蓄比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可能会更恰当。此外,参数估计的结果表明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虽然显著,但是其作用仍然比较有限,因此,今后的研究方向似乎更应该侧重刻画以医疗、教育、养老为主的社会保障方面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 [1] Hall, Robert.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 -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 86(December): 971 - 987.
- [2] Leland, Hayne E. . Saving and Uncertainty: The Precautionary Demand for Saving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8, 82: 465 - 473.
- [3] Hubbard, R. Glenn, Jonathan S. Skinner, and Stephen P. Zeldes. The Importance of Precautionary Motives for Explaining Individual and Aggregate Saving, in Allan H. Meltzer and Charles I. Plosser (eds.), *Carnegie - 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994, 40: 59 - 126.
- [4] Zeldes, Stephen P. . Consumption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97(April): 305 - 346.
- [5] Jappelli, Tullio, and Pagano, Marco. Saving, Growth,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 83 - 94.

(下转第 22 页)

共资源的权益,平等地享有通过经济社会发展而实现共同富裕的权益,也就是平等享有社会消费发展的权益。主要基于体制机制弊端而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社会成员之间在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上极不合理的高低悬殊,不合理致富者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其中凝聚有本应属于社会公众共同享有的交通、通讯、医疗、教育、文化及生活环境,而贫困者丧失了平等占有这些社会资源的权益,这既是收入分配权益的不平等,也是消费者之间权益的不平等,这决非改革开放的宗旨,直接背离了社会主义消费发展的基本方向。

为此,当前需要深入研究消费生活方式的阶层化或群体化现象,尽量少做那些易于引起群众反感的“被提高”、“被平均”等抹煞消费差异的事情。尽管这种平均化分析有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但在收入高低悬殊的情况下,它势必成为忽视差别的平均。计算平均应当为处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进一步提升消费需求服务,以占主导地位的大众平均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为基准,着力扶持低于该基准水平的部分居民,使之能够较快赶上平均水平,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发展水平,这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和谐运行的基石。从这个角度讲,新的发展方式是能够持续有效扶持贫困者,关照市场经济竞争中的弱者,使之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同样科学的消费发展方式,也必然是既能推进广大民众生活

水平的提高,又特别能够保障与改善贫困者的民生福利状况的消费。

此外,消费发展是持续的阶段性的发展;消费发展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一致性与差异性;消费发展与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的联系;消费发展的国际普适性与民族差异性;着力构建社会主义消费发展的方向与途径,特别是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消费发展方式,等等,这些重要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2.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7.
- [3] 顺便指出,我们对于消费过程中主体的创造性劳动及由此促进消费者主体素质的提升尚缺乏深入研究。笔者以为,这种人们在消费领域中的自主创造性活动不妨称之为“消费性的生产活动”,用以区别于生产领域的“生产性的生产劳动”。这应当是另文研究的课题。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8.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9.
- [6]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R]. 2011-10-18.

(上接第56页)

- [6] 万广华,史清华,汤树梅. 转型经济中农户储蓄行为: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2003(5):3-12.
- [7] 樊潇彦,袁志刚,万广华. 收入风险对居民耐用消费品消费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07(4):124-136.
- [8] 杭斌. 习惯形成下的农户缓冲储备行为[J]. 经济研究,2009(1):96-104.
- [9] 娄峰,李雪松.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动态实证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09(3):109-115.
- [10] 罗楚亮. 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J]. 经济研究,2004(4):100-106.
- [11] 郭英彤. 实证检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对我国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J]. 消费经济,2007(3):39-42.
- [12] Carroll, Christopher D. Buffer-stock saving and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12(1):1-55.
- [13] Carroll, Christopher D., Samwick, Andrew A., How Important is

- Precautionary Saving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8, 80(3):410-419.
- [14] Gourinchas, Pierre-Olivier, and Jonathan Parker. Consumption Over the Life Cycle [J]. Econometrica, 2002, 70:47-89.
- [15] Cagetti, Marco. Wealth Accumulation Over the Life Cycle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s [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2003, 21:339-353.
- [16] 郭英彤,李伟. 应用缓冲储备模型实证检验我国居民的储蓄行为[J].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2006(8):127-135.
- [17] Deaton, A. S. Saving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 [J]. Econometrica, 1991, 59:1221-1248.
- [18] Carroll, Christopher D. How Does Future Income Affect Current Consumption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111-148.
- [19] Kimball, Miles S., Precautionary Saving in the Small and in the large [J]. Econometrica, 1990, 58(1):53-73.